

異化、歸化與語言權力關係： 米爾頓《失樂園》兩種譯本翻譯策略比較

楊健威*

摘 要

本文先就米爾頓的基督教史詩《失樂園》兩種近代漢語翻譯版本進行翻譯策略比較與分析，再就英語與漢語的不對稱權力關係的情境下討論異化與歸化翻譯的政治能效。首先概述米爾頓詩作在近代漢譯的歷史，並簡要說明選擇楊耐冬與朱維之譯本的原因。另外，作者也將討論依塔瑪·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與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歸化與異化概念。在翻譯美學策略上，楊氏偏好重新組織原作，在體裁與語言架構上更貼近漢語讀者，而朱氏在譯作的文體與句法上力求與原作相近。在處理譯文的文化內涵上，楊氏偏好將原詩其中的基督教用語與英語文學元素轉換為漢語語符與對等元素，反觀朱氏則盡力保留原詩其中的神學用語與文學元素。本文列舉數個關鍵或較為繁複的詩行，如第一卷的開頭與第五卷中上帝召集天使的段落，以應證兩位譯者採用迥異的翻譯策略：楊的譯文體現了歸化的策略，而朱的譯體則偏向異化的策略。本文一併探討兩位分別來自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譯者在譯作中的差異是否亦映射文化體系的影響。若將英語與漢語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納入考慮比較兩種翻譯策略，也許楊氏的策略更能有效處理弱勢文化在翻譯外來作品所面對的問題。近年在中外學界對米爾頓在近代漢語世界的導入逐漸重視，但對於米爾頓漢語譯作及其文化意涵鮮少有較完整的探討，而這正是本文所著墨之處。

關鍵詞：《失樂園》翻譯、楊耐冬、朱維之、歸化、異化、權力關係、複體系

* 國立政治大學英語商管學程暨外文中心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and Power Relations among Languag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aradise Lost*

Yang, Chien-wei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wo translators respectively from Taiwan and China and ends with a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when English as an overpowering language i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 start with a brief sketch of the translation of *Paradise Lost* in the Chinese world and a summary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 translators, Yang Nei-dong and Zhu Wei-zhi. Itamar Even-Zohar's polysystem theory and Lawrence Venuti's concept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for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ang and Zhu's translation. I discover Yang has the tendency to replace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eth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original text with the Chinese near-equivalents and thus demonstrates a domesticating orientation while Zhu exemplifies a foreignizing tendency to transplant the Christian and literary elements in the translated text. However, here lie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se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case in Venuti's study. Chinese translators, unlike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must deal with the asymmetrical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so domestication, rather than foreignization, can be an efficacious strategy for

* English Taught Program and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the translators of peripheral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reverse the flow of cultural capital.

Key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aradise Lost*, Zhu Wei-zhi, Yang Nei-dong,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power relations

1. 前言：近代中國的翻譯論述

中國的翻譯活動在過去除佛經翻譯外，並不特別發達，而至晚明與清朝，始有大量的西方宗教與科學典籍譯入。¹至於西方文學作品的中譯則在清末與民國之交蓬勃出現，而文學界關於翻譯的討論也大量出現。²在各家立論中，林語堂、趙元任、錢鍾書三位影響深遠，三位所討論的翻譯範疇均為西語（尤其是英語與法語）譯為漢語為主。林氏進一步闡述了嚴復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尤其提出字譯與句譯之差，並以句譯為先以求語義忠實，並強調譯者以「中文心理」譯文。趙氏則以語言學的觀點，說明譯者如何在相異的語言間考慮語言符號的差異並以受語中的語義或語音相近的元素替代源語的元素。錢氏則將譯者定位為源語文本與受語讀者間的媒人，為國與國之間締結「文學姻緣」。³三人論點雖異，卻都隱含兩個立論前提：（1）翻譯過程中源語如英語與漢語做為受語的政治權力關係是對等的，（2）形與神是譯者的首要翻譯策略考量。然而，中國自十九世紀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起，便飽受以英、法為首的西方強國侵略殖民之害，而後英國的政治文化霸權又在二次大戰後交接給另個英語系國家—美國，其政治文化霸權與全球化的浪潮下影響力更甚前者。因此，當分析英語文本譯為漢語的現象時，吾人需了解譯者所面對的英語與漢語的語言文化關係並不平等，英語在近兩百年間對於漢語文化圈而言是一種強勢的、霸權的語言，如妮蘭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在1992年就提出當前翻譯研究未能考慮不同語言間的權力失衡關係(power imbalance)，這恐怕也是近

¹ 見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增訂版），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作者在序中提到中國歷史上經歷過三次翻譯活動的高潮，分別是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的西學翻譯。

² 詳見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0。

³ 關於三人論述，見劉靖之編，《翻譯論集》，臺北：書林出版社，1993。

代中國的翻譯論述較少著墨之處。⁴而中國歷來譯學討論多以形與神為主軸，形為語言風格與體裁，而神則為內容、思維、感受，強調翻譯至高境界即是形神俱似原作，即錢氏所稱的「化」。但是翻譯的過程並非發生於真空的環境下，譯者不僅需關注不同語言符號與語義元素的轉換，且往往受到所處時空環境與意識形態影響，不論譯者是否意識到此影響。所以在討論譯本，尤其是英語譯為漢語，還需將「境」列入考量，「境」即指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文學體系與所接觸的意識形態。所以本文在此提出如欲討論英語文本的翻譯應注意英語與漢語間的不對等關係，並在形神之外，納入多被忽略的「境」。另外，在後殖民論述中，翻譯亦被認為是最能考察殖民者權力行使的場域，但相關的研究多著重於被殖民他者的語言與文本如何在譯為英語的過程中，被譯者以殖民者的意識形態馴化。較少關注英語文本，尤其是文學正典，作為殖民或霸權語言的文化典範，如何在譯為被殖民者或相弱勢文化群體的語言的過程中被重製，而米爾頓的《失樂園》在英語文學正典中處於中心位置。其漢語譯文正是適合考察譯者如何處理強勢語言與文化霸權的場域。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早期討論翻譯時早已使用了歸化一詞，如林語堂，但其所用的歸化是指在語言風格上貼近原作的翻譯原則，以達林氏所講究之達一通順，方便讀者領略原作，與本文所使用的歸化概念不同，本文所談的歸化是種特定的翻譯策略的操作以突顯翻譯文字下的文化政治義涵，之後還會有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因此根據前述的語言間權力關係與形、神之外亦重「境」兩個原則，並以韋努蒂的歸化與異化策略作為理論起點，近一步分析約翰·米爾頓基督教史詩《失樂園》兩種漢語譯本的翻譯策略取向是否偏向歸化與異化策略，文末並討論弱勢語言的翻譯者在面對強勢語言需考量的語言政治

⁴ 見 Tejaswini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28.

及應採取的相應翻譯策略。

2. 莎士比亞與米爾頓在二十世紀的漢語翻譯

莎士比亞(Shakespeare)與米爾頓(Milton)雖自清朝或之前就被介紹到中國，也在清末或民國初年受到文學界重視，但莎士比亞的作品早自 1904 年就有林紓和魏易的文言文翻譯，而後又有梁實秋與朱生豪的翻譯全集，二十世紀末也有莎士比亞單部或部分作品翻譯問世。⁵相對於莎士比亞翻譯的蓬勃發展，米爾頓的作品在 1930 年代接連有兩部譯作問世，但在睽違五十餘年後才有再有完整的失樂園譯本於海峽兩岸問世，分別是楊耐冬與朱維之的版本。當然，其譯文篇幅宏大，因此本文試圖針對兩個版本中具代表性的譯文進行討論。

3. 《失樂園》在二十世紀的漢語翻譯

根據黃嘉音的研究，自十九世紀始，中國多種介紹外國歷史與文化的書籍就有提及米爾頓與《失樂園》，但多是簡略的介紹，未有完整的作品翻譯。在 1917 年的新文學運動之後，米爾頓逐漸受到文學界的重視，其作品始有譯本問世。⁶傅東華在 1930 年代所譯的《失樂園》是第一個較完整的譯本，惜傅氏未能克竟全功，只譯了全詩中的前六卷。傅氏的譯文的特色在於每一詩行都加上韻腳，與米爾頓原作所採的無韻詩體大相逕庭，因此引來許多批評，尤其梁實秋評論其譯文讀來有趣但不若原著，是因為

⁵ 彭鏡禧，〈莎劇中文譯本概述：台灣篇〉，《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二期（1999 年 7 月），頁 149-164。而由方平主編、主譯的詩體版《莎士比亞全集》也在 2014 年四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⁶ 黃嘉音，《把「異域」的明見告「鄉親」：彌爾頓與《失樂園》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翻譯／重寫》，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

體裁與風格異於原著，而朱維基亦認為傅氏譯文的語言風格缺乏白話文詩所需的生動變化。⁷ 朱維基稍後也出版了《失樂園》的翻譯，且是第一個完整的譯本，朱氏並嘗試以白話文譯出全詩，惜其譯作似未受到學界重視。⁸ 之後數十年《失樂園》未有翻譯問世，直到 1980 年代，海峽兩岸分別又出現《失樂園》的中文譯本，分別是臺灣楊耐冬於 1984 年的譯本以及中國朱維之於 1984 的譯本，而後又由臺灣的桂冠出版社於 1994 年發行繁體版。

本文選擇楊耐冬與朱維之的譯本作比較，主要因為兩個譯本均在距離 1930 年代五十餘年後問世，且兩位譯者的背景與所處文化體系有顯著的不同。楊耐冬與朱維之雖同為學者出身，且譯作甚豐，但楊耐冬，（本名楊書佃），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曾在台大、淡大、清華等校外文系教授英美文學課程，除翻譯工作外，也持續中文散文、新詩、短篇小說的創作，而朱維之溫州中學畢業後進入金陵神學院就讀，曾於協和與滬江兩所大學任教，之後在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渡過大部分教學生涯，開授課程涵蓋中國新文學、西方文學史，並於 1980 年代開始提倡比較文學。楊耐冬求學時期所處的台灣大學素以自由開放的學風而聞名，之後更以西方文學知名譯者的身分進入大學任教，而朱維之年輕時歷經國共分裂，進入大學任教後又遭逢文化大革命，因開授外國文學課程而遭到批鬥，直到文革結束後才回到南開大學。⁹ 兩人雖同為產量豐富的譯者，但所受的學術訓練不同，楊在外文系接受西洋文學的薰陶，而朱的學養根基於中國語文系與西方神學，之後兩人在 1949 年的政治巨變後又處於獨立發展的政治、社會、

⁷ 梁實秋，陳子善編，《雅舍談書》，臺北：九歌，2002，頁 151-164。

朱維基，〈評傅譯半部《失樂園》〉，《詩篇月刊》第一期（1933），頁 78-83。

⁸ 米爾頓著，朱維基譯，《失樂園》，上海：上海第一，1934。

⁹ 關於兩位譯者的背景，主要參考孟昭毅，〈朱維之先生與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第三期（2005），頁 70-77；陳文發，〈《書寫者，看見》，理想與現實的邊緣〉，《中華日報》，2014 年 6 月 23 日。

文化環境。所以兩位譯者雖有相同的母語，在《失樂園》的譯文中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遙譯美學，值得深究。

4. 翻譯、體系、歸化與異化

依塔瑪·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在 1970 年代提出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將文化視做一複合體系，而文學乃是其中的一支次系統，並與宗教、政治、科學等其他次系統產生互動。在文學的系統中，各個元素(elements)如典範、文本、實踐往往處於合作或競爭的態勢，當某些元素在文學系統內佔了優勢，便可主導系統，形成所謂正典化的形式庫(the Canonized repertoire)，主導文學品味與價值判斷。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這一元素往往為文學系統注入新生命，然翻譯者工作時所處環境並非真空，相反地，翻譯者總受到所處的授語(receptor)文化體系及文學體系的形式庫影響：「我們理所當然認為沒有任何一個翻譯作品與翻譯者能被單獨看待，因為翻譯與翻譯者不免在集體的規範與範本的情境下運作」。¹⁰ 本文將以佐哈爾對翻譯與所處的文化體系互動的理論來討論透過楊耐冬與朱維之的《失樂園》翻譯，兩位譯者如何受到所處的文化系統或文學形式庫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探討譯者所處的文化體系與情境如何互動，本文也以歸化與異化的翻譯策略比較分析楊氏與朱氏的翻譯。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翻譯者的隱形》中探討英美的霸權文化對於相對較弱勢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的運作機制，他批判英美翻譯者作品中的歸化(domestication)現象，即指非英語的文本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與出版機制必需迎合受語——即英語文化既有的價值與品味，將文本內容、語言風格、甚或傳遞的價值，

¹⁰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Studies*, Special Issue in *Poetics Today* 11.1 (1990) 151.

即所謂的「外異性」(foreignness)加以調整、消弭甚至改寫，以符合英語讀者的文化視野與價值判斷。受語文化以流暢(fluency)為主要翻譯標準，以便將非英語撰寫的文本統攝於英語霸權文化的體系內。而英語讀者在譯本的閱讀經驗中，反而有閱讀以英語書寫的文本之錯覺，未能體察自己正在閱讀翻譯文本。這也就是為何韋努蒂提出在如此的翻譯文化中，翻譯者是隱形的。誠如他在《翻譯者的隱形》一書所言：「英國與美國的出版社輪流不斷藉由成功地將英語文化價值強加在閱讀外國文學的讀者身上，以獲得財務上的利益，同時在英美兩國生成一種文化……習慣於流暢的翻譯並在讀者未能察覺的情況下將英美的價值觀寫入外語文本。」¹¹相對於歸化，異化(foreignization)則是韋努蒂所倡導的翻譯策略或是一種文化道德高度，¹²意即儘量呈現外國文本中詞彙、語法、特定語言與文化差異性，甚而加以突顯之。韋努蒂提倡以對抗(resistancy)的策略來避免霸權文化，將流暢視為唯一檢視翻譯的標準，更藉此「挑戰英美文化將種族中心論的暴力強壓於外語文本。」韋努蒂的立論是以霸權文化的角度探討翻譯的不平等現象，但若是弱勢文化的翻譯者在處理來自霸權文化的作品，則需截然不同的文化視野。因為若翻譯者採用韋努蒂所提倡的異化策略，反而可能加深了來自霸權文化作品的文化權威，削弱了受語文化的自我意識，並促進了霸權文化的正當性。而《失樂園》的中文翻譯恰可能處於此種情形，在此翻譯情境下，歸化與異化的策略應用可能造成不同甚至相反的影響，這也是本文想一併討論的。

此外，在此有必要釐清一般翻譯中所用的歸化與異化與韋努蒂所倡的歸化與異化。如羅選民所提出，一般所謂歸化(assimilation)與異化

¹¹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2.關於韋努蒂的異化策略的討論，亦可參考郭建中，〈韋努蒂及其解構主義的翻譯策略〉，羅選民編，〈結構·解構·建構：翻譯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9，頁199-213。

¹² 見郭建中，〈韋努蒂訪談錄〉，《中國翻譯》(2008.03)：44。

(alienation)是以語言層面的思考為主，用以區分譯者在用字與句法的選擇上貼近原語的程度，¹³但是韋努蒂的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是指翻譯過程如何反映甚而影響原語與受語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力互動。

5. 詩體與翻譯

《失樂園》翻譯工作的首要考量即是體裁的選擇。這也是梁實秋對傅東華譯本主要的批評之一。米爾頓《失樂園》所採的是無韻詩(Blank Verse)的詩體，即詩行不押腳韻。而學界的認知是米爾頓主要採用的格律為的音節詩體(syllabic verse)，而非重音詩體(accentual verse)。¹⁴意即每個詩行的總音節數需維持在十個，詩行總音節若超過十個，米爾頓往往透過引自義大利文學傳統的元音融合(synaloepha)與省音(elision)等技巧將詩行的音節數縮減至十個，但在每個詩行中的重音(heavy accent)數量則不定，理論上總數應在五，但仍有少於五的例子，需依詩句中強調的語義作判斷。¹⁵而《失樂園》的漢語譯者需處理語言層次與文體層次的異質性。漢字與英語雖同屬表音文字，但漢語各字以單音節為基本單位，且不具備屈折變化(inflexion)，在句法上，漢語屬形態弱勢，不依賴形態結構機制，而是以意合對接(parataxical linkage)，即是透過語意單元的邏輯關聯進行語意判讀。¹⁶另外，和屬印歐語系的英語不同的是，漢語在句法上的彈性與變化

¹³ 羅選民，〈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歸化翻譯〉，劉靖之，編，《翻譯新焦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頁65。

¹⁴ 見 Alastair Fowler, *Milton: Paradise Lost* (New York: Longman, 1971) 21.

¹⁵ 例如卷一的第一句詩行雖有五音步十音節，但主重音根據語義強調應落在“Man’s”、“first”、“fruit”等字上，重音數量不足五。見 Philip Hobsbaum, *Meter, Rhythm, and Verse Form* (London: Routledge, 1996) 12-3.

¹⁶ 漢字中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三為象形字，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為形聲字，漢字一開

較少，而且句子平均長度較英語句子短。¹⁷在詩體上，漢語文學似乎並無無韻詩與敘述長詩的傳統，而古體詩中，詩行以固定字數而非音節數介定，並搭配平仄與韻腳而非音節的重輕讀音變化形成韻體。與傅東華的版本比較，楊與朱的譯文顯然在形式上更貼近原作，但仍有程度上的差別，試以第一卷的第一至第十三行為例：

楊耐冬譯	朱維之譯
人因違抗上帝的命令偷吃禁果， 給世人帶來死亡的厄運， 也因此失去伊甸樂園而蒙受災禍， 直到一個偉人來拯救我們， 使我們重獲幸福的園地；	關於人類最初違反天神命令 偷嘗禁樹的果子，把死亡和其他 各種各色的災禍帶來人間，並失去 伊甸樂園，直等到一個更偉大的人來， 才為我們恢復樂土的事，請歌詠吧，

始在發展上是表意文字，但現代漢語已不具此特性。漢語在語言學上亦可稱為孤立語，主要是其不具屈折變化。關於漢語的性質與異質性。詳見了舒兆民與林金錫，編，《漢語語言學講義》，臺灣，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二章與劉宓慶，著，《翻譯與語言哲學》，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四章。
¹⁷ 見黃國彬，《語言與翻譯》，臺北：九歌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頁與劉靖之，編，《翻譯新焦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22-223頁。

<p>唱啊，天上的繆司， 您在奧列山頂或西奈山頂， 啟迪那牧羊人教導上帝所選的子民去 認知 在渾沌之初天地分開的過程與情景； 或在您更喜登臨的錫安山， 或在繞流聖廟的席洛亞溪畔， 我便在那裏呼喚您這位神， 願您來幫助完成這篇艱難的詩 歌，……¹⁸</p>	<p>天庭的詩神繆斯呀！您當年曾在那 神秘的何列山頭，或西奈的峯巔， 點化過那個牧羊人，最初向您的選民 宣講太初天和地怎樣從混沌中生出； 那郇山似乎更加蒙您的喜悅， 下有西羅亞溪水在神殿近旁奔流； 因此我向那兒求您助我吟成這篇 大膽冒險的詩歌，……¹⁹</p>
--	---

原詩：

Of man's first disobedience, and the fruit
Of that forbidden tree, whose mortal taste
Brought death into the world, and all our woe,
With loss of Eden, till one greater man
Restore us, and regain the blissful seat,
Sing heavenly Muse, that on the secret top
Of Oreb, or of Sinai, didst inspire
That shepherd, who first taught the chosen seed,
In the beginning how the heaven and earth
Rose out of chaos: or if Sion hill
Delight thee more, and Siloa's brook that flowed

¹⁸ 米爾頓著，楊耐冬譯，《失樂園》，臺北：志文，1997，頁 41-42。

¹⁹ 米爾頓著，朱維之譯，《失樂園》，臺北：桂冠，1994，頁 4-5。原譯本在中國於 1984 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Fast by the oracle of God; I thence

Invoke thy aid to my adventurous song, [...] ²⁰

以上對楊氏與朱氏的譯文做的初步比較，便可發現楊氏的譯文每個詩行長度不一，短則七字，長則達十八字，而朱氏的譯文每個詩行的長度相當接近，多在十三字上下，最短有十二字，最長有十五字，因此在形式上較貼近原文。更重要的是，楊氏試圖將每個詩行構成完整的句子，如譯文的頭兩句詩行已囊括原文第一至第三詩行的一半，而譯文的第六行「唱啊，天上的謬司」，對照原詩“Sing heavenly Muse, that on the secret top”則只有呈現原詩行的前半部，另一半則在譯文的第七行出現以形成意義完整的詩句：「您在奧列山頂或西奈山頂。」換言之，楊氏譯文中大部分的詩行都自成一語義完整的單元，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古體詩的絕句律言中的詩句類似，除卻押韻與平仄來看，絕句律言的每行詩句均自成完整的表意單元，但詩句間又有明確地邏輯關聯，是所謂各自表義，文脈相連。相反的，朱氏譯文的詩行架構則較接近原作，其譯文前三句詩行幾乎與原作對應，且朱氏並不刻意使每句詩行自構完整語義，譯文的第三句詩行又銜接了第四句詩行：「各種各色的災禍帶來人間，並失去／伊甸樂園，直等到一個更偉大的人來」，同樣的，在譯文第六與第七行以及第八與第九行中，上方詩句亦是銜接下行詩句，這樣的詩句安排似乎是要呼應原作的詩句架構，因為原著中往往是數個詩句綴連成一個完整的句子，如第六至第十詩

²⁰ 本文的引文來自 Alastair Fowler, ed. *Milton: Paradise Lost* (New York: Longman, 1971) 40-42 而非 Merritt Y. Hughes 所編的版本，因為 Fowler 版本的特色在於編者以現代拼音取代多數舊式拼音（特定人名與地理名詞除外），但並未更動了原本的標點符號，也因此保留了原作詩行的結構。經筆者比較本文所討論的三大段引文中，兩個版本的標點符號絕大多數是一致的，只有在第五卷的第五百八十七行末端，Hughes 版加上了“;”，而 Fowler 版則無。但此標點符號的差異並不影響譯者對原詩的判讀，因就句法上譯者應能判斷第五百八十七行已是原詩節的最末一行，第五百八十八行實隸屬下一詩節的第一行。

行的“chaos”構成一完整的句子。

若進一步比較兩段譯文，我們會發現楊氏譯文的用字較貼近漢語語法，而朱氏用字則與中譯聖經語言風格相仿，如原詩第五行的“blissful seat”，楊譯為「幸福的園地」，在漢語象徵一般性的美好情況，而朱則將之譯為「樂土」，義近聖經所說的「許諾之地」。原作第七行的“inspire”，楊譯為「啟迪……去認知」，而朱則譯作「宣講」，正呼應了耶穌在聖經福音書記載中，向信徒傳播教義之意象。原作第九行初的“In the beginning”楊譯為「渾沌之初」，雖與創世紀中上帝創世之初的渾沌相應，但渾沌亦可對應漢語文化中的創世神話，而產生了讀者在理解上的模糊。而在原作的第十二行中的“the oracle”，楊譯為「聖廟」，使讀者易將其象徵意義與中國宗教場域產生聯想，朱則將其譯為「神殿」，更符合原作的神學義涵。透過以上的分析，楊氏似乎在處理詩韻時，向漢語的文學資料庫借鏡，詩行的架構不但偏離了《失樂園》音節詩的原理，還具有漢語文學中絕句律言特有的表義結構。而朱氏極可能因個人的基督教背景與神學訓練的文化體系影響，在譯文中儘量保持原作的神學元素，避免使用與漢語文化體系類似的語言元素取代。

而在卷二的 988 至 1002 行中，人格化的渾沌回應撒旦的詢問：

楊耐冬譯	朱維之譯
撒旦這樣講完後， 那無政府狀態之國的暴君面露不安神色， 顫抖著聲音回答說： 客人啊，我也知道你是誰， 你就是天使班中的大天使，有威能的首領， 你是最近背叛天君的，	撒旦說罷；那渾沌老王 聲音顫抖，容色不安地回答道： 「客人啊，我知道你是誰， 是最近背叛天神的大能天使長， 可惜沒有成功，這事我親見親聞。 因為這麼多的軍隊紛紛逃往

<p>只可惜罰你沉淪的刑期還未期滿， 這些事我這邊也曾聽說過； 當那逃劫的羣眾經過這裡時， 那紛亂之聲本來就不是默然無聲， 那聲音也震撼了幽冥界，令人驚駭， 一陣陣的追殺，一排排的倒下毀滅， 一片混亂，愈來愈見紛紜； 天門裏放出百萬雄兵，益發追得緊。 我那時手在邊庭， 只想盡我所能，防護我那殘留的境地， 因為我的國內也是內訌日甚， 到今天四方被蠶食還沒有個完， 「夜」的權威也愈來愈受侵佔，……²¹</p>	<p>深淵時不是靜默無聲的， 它使這幽冥界盡都驚駭， 毀滅上加毀滅，潰敗上加潰敗， 紊亂上加紊亂，天門裏傾注出 千百萬乘勝追擊的龐大隊伍。 我住在這片領地裏，盡力保持它， 這古老的『夜』的主權一天天縮 小。²²</p>
---	---

原詩：

Thus Satan; and him thus the anarch old
 With faltering speech and visage incomposed
 Answered. I know thee, stranger, who thou art,
 That mighty leading angel, who of late
 Made head against heaven's king, though overthrown.
 I saw and heard, for such a numerous host
 Fled not in silence through the frightened deep
 With ruin upon ruin, rout on rout,

²¹ 楊耐冬，152-3 頁。

²² 朱維之，132-3 頁。

Confusion worse confounded; and heaven gates
 Poured out by millions her victorious bands
 Pursuing. I upon my frontiers here
 Keep residence; if all I can will serve,
 That little which is left so to defend,
 Encroached on still through our intestine broils
 Weakening the scepter of old Night [. . .]²³

朱氏同樣試圖在譯文中貼近原作的詩句結構，引文的第一個詩行以分號連繫兩句，兩句的主、授詞為撒旦與渾沌本尊互換，以及副詞“thus”的重複，是為回文(antimetabole)的修辭技巧，但楊氏譯文第一行僅敘出原詩行的前半部“Thus Satan”，將原詩行形成回文結構的後半部移至第二行，以構成語意較完整的詩行，包含了主詞、動詞與補語，而非原詩兩個用來修飾渾沌本尊“anarch”的介繫詞片語，如此一、二詩行各成語意完整的表意單元。楊氏譯文忽略原詩特有的回文結構，改以符合漢語句法邏輯的句子取代之。朱氏譯文第一行雖未能完全重現原詩的回文結構，但仍保留了分號與前、後半部的主、授詞，第二行的動詞片語結構也與原詩的兩個介繫詞片語呼應。

而原詩的第 995 與 996 行採平行結構(parallelism)，描繪叛變天使軍團為聖子所敗潰逃紛亂之狀。米爾頓以“ruin”、“rout”、“confusion”三字疊置透過介繫詞相連，楊氏譯文試圖重現原詩結構，以漢語的單位疊字形成排比：「一陣陣的追殺，一排排的倒下毀滅，／一片混亂，愈來愈見紛紜」，以漢語的對應字詞「一陣陣」、「一排排」、「一片」替換原詩行的疊字。第一行呼應了原詩的平行結構，但不知為何將第一詩行的兩詞顛到。而第二

²³ *Paradise Lost*, Bk. 2, ll. 988-1002, pp. 136-7.

行後半部的「愈來愈見紛紜」卻又與平行結構相異。反觀朱氏明顯意圖重現原詩的平行結構，以三個「上加」連綴了複現的「毀滅」、「潰敗」、「紊亂」三詞，形式上較接近原作。

另外，第 988 行撒旦稱混沌本尊為“anarch”一詞是翻譯《失樂園》的艱鉅挑戰；米爾頓常善用他古典語文知識自創字詞，此處是一例。據 Alastair Fowler 的推斷，此字應為米爾頓模仿 Monarch 對應 Monarchy 的字義關係而將 Anarchy 一字去其字尾所創的。²⁴Anarchy 一詞係指 Chaos 人格化的本尊，而其字源自希臘文的 ἀναρχία，在中古拉丁文以 anarchia 表示，意指缺乏治理者之失序狀態，所以“anarch”一字可指渾沌狀態的統治者且其存在與統治正當性，正是與詩中上帝相矛盾的反統治者 (anti-ruler)。²⁵此字在米爾頓發揮詩人創意與汲取西方古典語文傳統下幾乎不可譯，在漢語系統中幾無在語義上接近的字詞。楊氏將其譯為「那無政府狀態之國的暴君」，未能顯明統治者與混沌領域的關聯，而「暴君」一詞似乎亦非作者本意，相較之下朱氏的「混沌老王」為一新創詞，一併將形容詞“old”納入其中，更貼近原詩但明顯與漢語慣用字詞搭配相異。第 995 行的“rout”在此應是指軍事上的一方遭擊潰而敗逃，如莎士比亞在《辛白林》(Cymbeline) 所述：“Anon/ A Rowt, confusion thicke: forthwith they flye”，²⁶與其後的“confusion”呼應，而“rout”亦可指海潮與雷聲等巨大的聲響，亦呼應在第 994 行渾沌本尊所提及的撒旦一方敗逃紛沓的喧囂聲，是一雙關語(double entendre)的使用。²⁷朱氏將其譯為「潰敗上加潰敗」，雖讀

²⁴ *Paradise Lost*, Bk. 2, l. 988, p. 136, note.

²⁵ “Anarchy, n.,”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6, web. 7 August 2016. Anarchy 的希臘文為 ἀναρχία 包含了字首 ἀν，指缺乏，與本字 ἀρχή，指領導者。

²⁶ 此例為《牛津英語詞典》所提供之一例，見“Rout, n., 2. a, b,”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6, web. 7 August 2016.

²⁷ “Rout, n., 4,”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6, web. 7 August 2016.

來與漢語語法有異，但更接近作者隱含的延伸語義。

在卷四楊氏的譯文同樣出現已轉換漢語語言邏輯的歸化傾向。亞當向夏娃揭示造物主形構宇宙與萬物的奧妙之處，尤其是星體於夜間的運行原理，說道：

“[...] these soft fires/Not only enlighten, but with kindly heat/Of various influence foment and warm,/Temper or nourish, or in part shed down/Their stellar virtue on all kinds that grow/On earth [...]”²⁸

楊氏譯為：「星星與月亮的光不但可以照明，／它們的柔和與熱力更可以影響各種生命，／使地上萬物調和、孕育、吸取溫柔的特性與溫和的熱。」原詩中此段為一長達十四詩行的複合－複雜句(compound-complex sentences)的後半部，故主詞“these soft fires”以月亮與星星特有的溫潤光芒替代原星體，為提喻(synecdoche)的應用，而在此複合－複雜句中提喻詞與原借代主詞已有五詩行的間隔，且此種語意透過同位語與各式子句連綿不斷長達數個詩行的句法與漢語句法不合，所以楊氏顯然又將其句法改變，原詩第二行為此段平行結構(parallelism)的第一部分，以相關連接詞(correlative conjunction) 即“not only”與“but”繫接六個動詞：“enlighten”、“foment”、“warm”、“Temper”、“nourish”、“shed down”，但此原詩行中只有呈現整組相關連接詞的與第一個動詞“enlighten”，且其三音節的語音特徵與近乎詩行中央位置使得此字應為此詩行的關鍵字，但若直譯為漢語只構成一個的片段式的詞語：「不僅照耀了且藉其溫熱」，所以楊氏將其轉化為更符合漢語句法的詩句，使每個詩句保持為較完整的語意單元，其譯文的第一個詩行實際上將原詩第一至第二行“enlighten”為止的詩行重組。而

²⁸ *Paradise Lost*, Bk. 4, ll. 234, pp. 667-72.

譯文的第三行則將“foment”、“warm”、“Temper”、“nourish”、“shed down”等及物動詞的主詞改為「地上萬物」，使第三行譯文亦成語意較完整的單元。朱氏則將此段譯為：「不僅用這些柔和的火光照耀，／並用各種天然的暖氣薰蒸、養育，／或者把部分星星的效能灑落/在地上一切生物上面。」相較楊氏譯文，朱氏譯文字序貼近原詩，第二詩行最末字是動詞與原詩相同，第三詩行末的「灑落」亦是如此。

6. 兩種譯本與兩種翻譯策略

再比較另一段譯文，第五卷的第 577 行至 585 行，此段詩是大天使拉斐爾向亞當描述上帝在天庭召集眾天使的情形：

楊耐冬譯	朱維之譯
<p>當初這世界尚未存立， 天外天一樣存在，各星體在運行； 地球懸於空中的中心， 這廣大的空曠為「洪荒」所佔領 那時既無始也無終，是一個無極的境界， 但有過去、現在、未來不停地推進， 也有時日的區分。 各種天體運行一周完畢為「大歲」， 有一天，正是「大歲」之日， 上帝下詔召集清火天使的軍旅， 從天上四境擺出光輝陣，</p>	<p>起初還沒有這個世界的時候 空漠的渾 沌佔領者如今旋轉的諸天， 地球凌空懸掛在中心的地方； 有一天（時間是永恆的，無始 無終，但也用過去、現在、未來， 用以測量萬物連續不斷的運動）， 那天正是天上大年的開始， 各天使軍由敕令召集而來， 分別在各自首領的麾下， 成千上萬，從天的四隅出來， 閃動著灼眼的光亮，排列成行， 在全能者的寶座面前顯現。</p>

由各路天使首領率領，
 來到全能的上帝寶座前，
 浩浩蕩蕩，無可數計。
 十億旌旗高舉在前鋒後衛之間，
 旌旗在空中招展，分外鮮明。……²⁹

千萬種旌旗號高揚在空中，
 在前鋒和後衛之間迎風招展，……³⁰

原詩：

As yet this world was not, and Chaos wild
 Reign'd where these heavens now roll, where earth
 Now rests
 Upon her center poised, when on a day
 (For time, though in eternity, applied
 To motion, measures all things durable
 By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on such day
 As heaven's great year brings forth, the empyreal
 Host
 Of angels by imperial summons called,
 Innumerable before the almighty's throne
 Forthwith from all the ends of heaven appeared
 Under their hierarchs in orders bright
 Ten thousand thousand ensigns high advanced,
 Standards, and gonfalons twixt van and near
 Stream in the air [. . .]³¹

²⁹ 楊耐冬，315 頁。

³⁰ 朱維之，316-7 頁。

由楊氏的譯文仍可見到每個詩行仍構成語意完整的句子，如譯文第 9 行實是原詩第 579 中的一個片語 “when on a day”，但卻被改寫為完整的句子。同樣的，譯文第 14 行所使用的兩個成語來描述天使眾多也是將原作的一個形容詞 “innumerable” 加以擴充。原作自第 577 行末至第 579 行止說到在各大天體與地球出現前，世界仍是一片渾沌，楊氏的譯文將第 578 與 579 行顛倒：「地球懸於空中的中心，／這廣大的空曠為『洪荒』所佔領。」譯文雖然讀來通順，卻未能點出原作所強調的時間的距離感。另外，原詩第 580 行至 582 行為一段對於理解時間的說明並加上括號，楊氏的譯文卻將括號去除，且將原詩擴充（擴充的文字以粗體標示）：「**那時既無始也無終**，是一個無極的境界，／但有過去、現在、未來不停地推進，／**也有時日的區分**。」第三個詩行並未在原詩出現，似乎是譯者對此段譯文所陳述概念的補充說明，並幫助承接譯文的下一詩行。朱氏的譯文則是儘可能配合原作的句構，如同樣譯原詩第 580 行至 582 行，朱譯為（擴充的文字以粗體標示）：「（時間是永恆的，**無始／無終**，但也用過去、現在、未來，／用以測量萬物連續不斷的運動）」。朱不但保留了括號，並將 “applied to motion” 融入第三個詩行，譯文的整體結構也與原作相近，原詩行的主詞 “time” 不論在語義上或位置上都獲得應有的重視，主動詞 “measures” 也與主詞產生明確的聯結。而在選字上，楊氏的譯文依舊嘗試用漢語讀者熟悉的詞彙去比附原詩的用詞，例如「天外天」意指宇宙中交疊運行的天體、「洪荒」表示上帝創造世界的混沌狀態、「無極的境界」意為時間的無限性、「大歲」則是在天界的時間單位。其中「天外天」呼應了東方的神祕宇宙觀，「無極」一詞則有三教色彩。³²在朱氏的版本用的

³¹ *Paradise Lost*, Bk. 5, ll. 577-90, p.p. 293-4.

³² 誠然，諸家思想之中以道教對於「無極」思維的詮釋最為體系化。不過，儒家、

分別是「旋轉的諸天」、「渾沌」、「時間是永恆的」與「大年」，依然較符合原詩的時代觀點與宗教意義。

類似的例子甚多，如在第十二卷第 624 行，楊氏將“our mother Eve”譯為「人類的母系祖先夏娃」，其中「祖先」一詞明顯帶有漢語文化的倫理義涵，而朱氏譯為「我們人類的母親」更能傳達原作獨有的基督教譜系觀。而第 628 行提及了“cherubim”，此天使在中世紀的神學教義中為九階層中位居第二位的天使，職掌護衛上帝寶座與看守生命之樹，³³楊譯為「所有的天使」，未清楚說明其等級，而朱則將其譯為「基路伯隊伍」，序明了它們在天界的位階。而在第 647 行，當亞當與夏娃踏出伊甸園，原作道：“and providence their guide”，楊譯為「天命的安排」，其中天命一詞屬於漢語文化的命定論。朱則以「神的意圖」一詞重現原詩的特有的基督教倫理觀。楊氏這些譯詞雖使得讀者較容易理解原作之意，但由於這些詞彙在漢語文化早以積累了豐厚歷史義涵，是否往往使得讀者侷限於自身文化體系觀點與價值判斷，未能夠透過翻譯一窺異文化體系所凝聚於文本中的源語文化？

透過以上兩段譯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楊氏的譯文將原詩的句構與用字大量轉換為漢語系統，但朱氏的譯文則試圖保留原作的文體形式與文化內涵。若以圖瑞 (Tourey)³⁴的理論觀之，楊氏的翻譯策略偏向建立譯本的可被接性 (acceptability)，也就是以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視野來呈現原作，

道家，甚至佛教對於「無極」思維亦有所探討，舉例而言，《春秋繁露》說：「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眾多，永永無疆。」《道德經》說：「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至於佛教，無論是發展初期的格義階段，還是隋唐時期的三教交融階段，皆無可避免必須對於中國傳統核心觀念有所回應，其中應當包括「無極」的觀念。

³³ 天使位階的概念在中世紀發展完備，但丁在《神曲》天堂篇，第二十八首，第 99-129 行中也曾提及天使的九個位階。

³⁴ 關於 Tourey 對於可被接受性與適當性的討論，見 Gideon Toure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 69-75, 93-98.

而朱氏的翻譯策略則是強調翻譯成品的適當性 (adequacy)，儘可能保持源語及指涉義涵在轉換過程中的純度。

至於楊耐冬與朱維之在處理《失樂園》中饒富基督教義涵之詞彙的差異，也可從翻譯者所處的文化體系來探討。基督教與天主教在台灣自 1940 年代以來，均能自由發展，不受政府管制與干涉。另外，國民黨政府重尊儒家思想，強調忠孝倫理觀，將孔孟思想尊為政治與生活典範。反觀在 1949 年後的中國由於政府的意識形態，加上近代在政治與社會的動盪，基督教與天主教的發展受到很大限制，而中國宗教的發展一直到 1982 年國務院發布「十九號文件」後，開始予以受官方承認的宗教一定的發展自由，但仍需受國家的監督與領導。³⁵1991 年國務院又發布「六號文件」，強調宗教需服務共產黨與國家，基督教義中不符社會主義的觀念如末日觀則受到壓抑。而《失樂園》是一部基督教史詩，自出版以來便廣受基督徒喜愛，甚至被視作第二部聖經，朱氏譯作中將詩中與神學教義相關的詞彙均以符合神學教義的方式呈現，除了反映出譯者個人的神學背景，是否也是譯者對當時的宗教政策與文化環境的一種抵抗？基督的福音雖無法公開傳播，但仍可以文學正典為媒介，藉文字翻譯為手段來傳遞。相反地，楊氏的版本往往將此類詞彙轉化為漢語文化的對應元素，尤其是儒家價值觀與漢語文化的宇宙觀，重視的是原詩的文學價值而非宗教價值，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譯者所處的文化環境中，宗教發展未受壓抑，譯者沒有將翻譯視作能較有效傳遞個人信仰的媒介，並嘗試將原作中人神的神聖關係以漢語的倫理觀重構。如在第五卷末，當低階天使亞必迭公開挑戰撒旦權威並決定與叛變得天使軍團決裂時，米爾頓讚揚祂的信念：“So spake the

³⁵ 關於基督教在中國與臺灣的發展，見羅傳虹，《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2004 與沙百里著，耿昇、鄭德弟譯，古偉瀛、潘玉玲增訂，《中國基督教徒史》，臺北：光啟文化，2005。

seraph Abdiel faithful found/Among the faithless, faithful only he.”³⁶ 此處的“faithful”與“the faithless”都具有明顯的基督教義涵，指對神的信念，在神學教義中是希望的支柱，朱將“faithful”譯為「忠誠」與「忠信」，將“the faithless”譯為「背信者」，符合基督教的倫理觀。反之，楊卻將“faithful”譯為「忠貞節義」與「忠心耿耿」，將“the faithless”以「群逆不義」替換，採用了儒家的忠君的倫理觀與漢語傳統政治論述中的正統與反逆的二元論。

7. 面對霸權文化：弱勢語言與歸化翻譯

楊氏的翻譯策略若以韋努蒂的理論觀之，較接近一種漢語譯者對英語文本的歸化，而朱氏的翻譯策略則近異化。楊氏採用的詞彙與句構貼近漢語文化的讀者，而朱則盡量保留原作再詞彙、語法、句構的外異性 (foreignness)。楊氏此種翻譯取向與朱氏相較，也許被視為轉換源語文本的「失真」，但如同韋努蒂一再強調的，翻譯本是重建語境的過程，讀者需認知到譯本與原文本質並不相同。³⁷所以翻譯可以是讓譯者與讀者認識並處理源語與受語文化品味與價值觀差異的轉換場域。但若將翻譯者所處的文化體系即「境」列入考慮的話，楊氏採取的也許是一有效的翻譯策略。韋努蒂是以英語霸權文化的本位思考相對弱勢語言在譯為英語時如何受到歸化與異化取向影響，但在本文討論中，源語與受語的權力關係卻是顛倒的；在《失樂園》的漢譯中，源語是英語，是霸權語言，受語是相對弱勢的漢語。

在此語言權力關係中，楊氏的翻譯策略，不失為弱勢文化的成員對於

³⁶ *Paradise Lost*, Bk. 5, ll. 896-7, p. 311.

³⁷ 〈韋努蒂訪談錄〉，45頁。

霸權文化的一種回應手段。因霸權語言文化與相對較弱勢語言文化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交流並非對等，霸權文化的文化資本往往被大量導入相對較弱勢的文化，而翻譯往往是此導入過程的手段。³⁸因此，若弱勢文化的翻譯者一味突顯霸權文化文本原有的外異性(foreignness)，即霸權文化的外徵，反而可能形成霸權文化資本的淨流入，益加鞏固了原來霸權文化與弱勢文化間的不對等關係，韋努蒂亦認為異化翻譯的最終目的就在於「最終是否能顛覆和挑戰接受語背景中的文化價值觀的秩序。」³⁹因此在強勢源語與相對弱勢受語的權力關係中，異化反而可能進一步鞏固源語文本的文化權威，並削弱受語讀者對於自身文化價值觀的認同。余光中就曾撰文討論到翻譯已對中文語法造成負面影響，形成所謂的「翻譯體」。印證至少在語言的使用上，漢語使用者受到英語的牽制已是普遍的現象。⁴⁰反之，對英語文本的歸化翻譯反而能透過翻譯的實驗彰顯漢語文學系統的多變性與包容性，在文本中讓英美霸權文化與相對較弱勢的漢語文化以對等的位置互動，如傅東華翻譯《失樂園》提出的理想，認為翻譯可以幫助中國的文學系統展出「新體的韻文」，對於受語的文化系統產生正面效益。所以韋努蒂對於歸化與異化的討論當應用於弱勢文化的翻譯時，也許有翻轉的可能。

³⁸ 筆者在此處借用了彼耶·布狄爾(Pierre Bourdieu)所提出文化資本的概念。布狄爾原以此概念解釋社會階級差異何以產生並在世代間延續。而書寫隸屬其中的第二類：具體化型態(the objectified state)。而筆者此處所論及的文化資本乃指為某一國族所共有的文化媒介與內涵，可以不斷再生產並擴散，也可能停滯發展並萎縮，此外，文化資本如同經濟資本具有高流動性，能輕易穿越政治疆界。關於布狄爾的文化資本，見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1986) 241-58.

³⁹ 〈韋努蒂訪談錄〉，頁 46。

⁴⁰ 見余光中，〈翻譯和創作〉，劉靖之編，《翻譯論集》(修訂版)，臺北：書林，1993，頁 127-133。

8. 結語

本文試圖在傳統譯學論述的「形」與「神」的考量外，一併思考《失樂園》譯者面對譯「境」的問題。除了以複系統理論來討論譯者如何受到文化系統內宗教與文學形式庫的影響，更在比較楊氏與朱氏的譯文後，發現楊氏與朱氏分別採取偏向歸化與異化的翻譯取向。而兩位譯者所處的譯「境」恰又與韋努蒂原先討論的文化情境不同，所以本文最末又提出以歸化為取向的翻譯策略，以嘗試處理相對弱勢文化在面對霸權文化可能面臨的文化資本不對稱問題。

參考書目

- 王紅玫。〈朱維之基督教文學翻譯觀研究〉。《現代語文》，第三期(2005)，124-8。
- 朱維基。〈評傅譯半部《失樂園》〉。《詩篇月刊》第一期(1933)，78-83。
- 朱維基。《失樂園》。上海：上海第一，1934。
- 朱維之譯。《失樂園》。臺北：桂冠，1994。
- 孟昭毅。〈朱維之先生與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第三期(2005)，70-77。
- 沙百里著，耿昇、鄭德弟譯，古偉瀛、潘玉玲增訂。《中國基督教徒史》。臺北：光啟文化，2005。
-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增訂版)。北京：中國對外翻譯，1998。
- 梁實秋，陳子善編。《雅舍談書》。臺北：九歌，2002。
- 彭鏡禧。〈莎劇中文譯本概述：台灣篇〉，《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二期(1999年7月)，149-164。
- 黃國彬。《語言與翻譯》。臺北：九歌，2001。
- 黃嘉音。《把「異域」的明見告「鄉親」：彌爾頓與〈失樂園〉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翻譯／重寫》。博士論文，台灣大學，2006年5月。
- 舒兆民、林金錫編。《漢語語言學講義》。臺灣：新學林，2008。
- 楊耐冬譯。《失樂園》。臺北：志文，1984，1997再版。
- 劉靖之編。《翻譯論集》(修訂版)。臺北：書林，1993。
- 劉靖之編。《翻譯新焦點》。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2003。
-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臺北：書林，2000。
- 郭建中，〈韋努蒂訪談錄〉，《中國翻譯》(2008.03)，43-6。

-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0。
- 陳文發。〈《書寫者，看見》理想與現實的邊緣〉。《中華日報》，
2014年6月23日。
- 羅傳虹。《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羅選民編。《結構·解構·建構：翻譯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2009。
- Bassnett, Susan and Harish Trivedi. E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Web. May 24 2016.
-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1986. 241-58. Print.
- Hobsbaum, Philip. *Meter, Rhythm, and Verse Form*. London: Routledge, 1996. Print.
- Itamar, Even-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Special Issue in *Poetics Today* 11.1 (1990). Web. April 2 2016.
- Milton, John. Ed. Alastair Fowler. *Milton: Paradise Lost*. New York: Longman, 1971. Print.
- Niranjana, Tejaswini.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Print.
-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6. Web. 7 August 2016.
-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 Print.
-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rint.